



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古代社会占有重要地位,“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既包括指代读书人的“士”,也包括泛指官员的“大夫”,他们凭借自身的学识和能力成为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国家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以及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佼佼者。自孔子提出“士志于道”的思想内核后,这一价值观念作为士大夫群体的理想追求恒久未变,其独特的内涵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7月15日,河北博物院推出年度院藏文物特展“士志于道——明清士大夫的理想人格”,精选院藏明清文物236件(套),包括日常器用、雅玩之物和名人书画等品类,珍贵文物占比达95%,其中孙承宗画像卷、张之洞电稿等文物为建院以来首次展出。展览通过“俗世雅趣”“兼济天下”两个篇章,阐述了明清士大夫道不离器的美学追求、正己修身的人文理想和兼济天下的经世情怀,重点呈现了明清畿辅地区士大夫群体清刚峻正的士气风貌。

士志于道

明清士大夫的理想人格

俗世雅趣

第一部分“俗世雅趣”分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花”两个单元,从饮馔之器、佩戴之饰、家居陈设等生活日用,以及琴棋书画、诗酒香花,乃至修庭造园的雅致情趣,展现明清两代士大夫阶层文化追求的共同兴味与不同特质。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多项传统技艺都达到历史的巅峰,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互相影响交融,遗存下来的各类文物珍品集富丽、清雅、活泼于一体,形成独特的风格和时代特色。绣墩是古代的一种坐具,因人们喜在上面盖一层织绣坐垫而名“绣墩”,造型似鼓,又名“鼓墩”,绣墩作为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的家居艺术品在明清大受欢迎,成为士大夫家中常设之物,《红楼梦》第三十八回“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第八十五回“贾存周报升郎中任”的情节中就有关于绣墩的描写。

明清时期,历代玉雕技术被充分吸收并进一步发展,琢玉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用质料有白玉、碧玉、玛瑙、水晶等,所见器物小到各类饰件,大到雕像与实用器,不一而足。展览展出的明代透雕花青玉佩(图3)、透雕松鹿纹青玉佩(图4),一件中部镂空雕七瓣花,花蕊上饰网格纹,向外饰十六连珠纹,最外缘为八朵如意形云朵;一件镂空雕十朵灵芝状云为边,中部透

雕古松、鹿、桃实主题纹饰,两件玉佩技艺精湛,华美富丽。

陈设玩赏类玉器的制作工艺在明清达到极致,集阳线、阴线、镂空、俏色等传统技法创造出绚丽多姿、新颖别致的各类形象。清人物亭台青玉山子(图5)雕琢浮云环绕的古木苍松、亭台楼阁、小桥人物等景色,呈现高低错落、深浅对比的特殊效果,是陈设玉器中的精品。

士大夫阶层一方面和市井大众同样经营着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讲求物质生活的世俗化享受;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有着超越寻常百姓的艺术化追求,营造了文人士大夫独有的精神世界。观花、赏石、焚香、挂画、搜罗金石古物、寄情园林山水,是古代文人士大夫重要的休闲活动,在明清成为一时风气。用于焚香的清线雕花青玉熏炉(图6),由炉盖、炉身、炉座三部分组成,盖壁、器身镂空雕繁复的花卉纹,并镂空有兽衔环耳,器座为鼓形,浅浮雕兽面纹,整体造型华丽非常。

清初名臣成克巩,直隶大名(今邯郸大名县),官至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秘书院大学士等,致仕后于河南浚县营建浮丘山房为别墅。成克巩多次主持乡试、会试,杰出门生众多,这幅《浮丘山房图卷》(图7)即是其门生米汉雯所作。米汉雯为宛平人,晚明四大家之一“石痴”米万钟之孙。图中山峦起伏,延绵不断,滩路溪桥环于山下,树木房屋隐于山间,马世俊小楷引首《浮丘山房记》,拖尾胡世安、李蔚、王崇简、梁清标、魏尚奇等跋,集一时名家,粲然可观。

兼济天下

第二部分“兼济天下”分为“五百名中第一先”“仕路谁堪语肺肝”“不朽名垂天地间”三个单元,讲述明清士人读书科举,宦海浮沉的人生旅程,展现明清士大夫中的杰出代表,尤其是畿辅士大夫群体经世致用、胸怀天下的理想抱负。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认为,士大夫的人生境界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学而优则仕,既是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是士人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而将个人理想与天下国家紧密相连,胸怀天下,明道济世,正是士大夫追求的道义所在。

登瀛,在清代是指进士及第的授官仪式。这幅《梁清标登瀛洲图轴》(图8)中,主人公梁清标气宇轩昂,身着红袍,头戴乌纱,身后侍从手执羽扇,前方白马待行,描绘了一幅新官受命、走马上任的画面。梁清标是河北正定县人,字玉立,号苍岩、蕉林等,官至兵部、礼部、刑部、户部四部尚书,诗词修养甚高,精鉴赏,被后世誉为收藏家中的“收藏家”。

这方出土于河北大城县刘汉儒墓的狮钮金印(图9),不仅体现了士大夫阶层雄厚的经济实力,其铭文“一品百龄”也反映了士大夫希图官居一品、寿享百龄的祈愿。明清士大夫群体或身处治平之世,或历经王朝鼎革,跻身时代的洪流中,在面对忠孝节义的两难抉择时,消极者“逃禅”避世,而更加注重实力力行、经世致用的畿辅士大夫往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担当。

朱奎的《芦雁图》(图10),以写意手法描绘两只芦雁,并饰以浅绛,一动一静,俯仰呼应,画面中怪石兀立,以芦草为点缀,气韵生动,构图巧妙。朱奎为明王室后裔,明亡后一度为僧,又当道士,擅水墨花卉鱼鸟,笔墨简括凝练,极富个性,署款“八大山人”,连缀似“哭之”或“笑之”,寓离亡国之痛。

孙奇逢,河北容城县,明末清初理学大家,与黄宗羲、李颀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明清两朝征聘11次而不就,人称“孙征君”。清初南迁河南辉县苏门山下之夏峰村,讲学20余年,世称“夏峰先生”,有“北方孔子”的美誉。孙奇逢《苏门记事卷》(图11)展示了孙奇逢晚年论治学、交友等杂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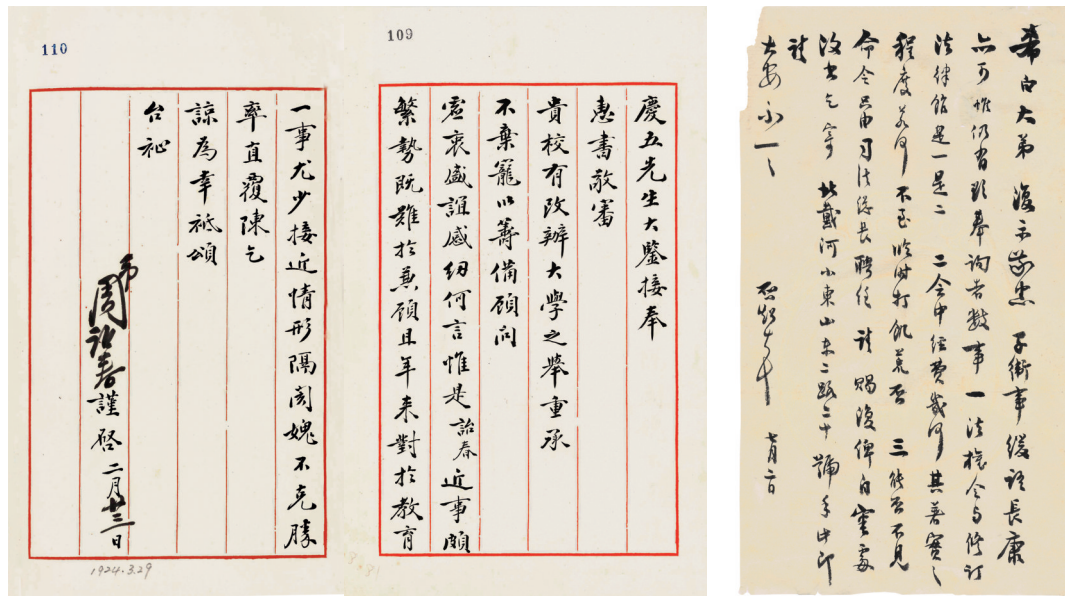
张之洞,河北南皮县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洋务派代表人物。此次展出的张之洞电稿(图12),绝大部分日期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之间,正是张之洞湖广总督任内,办洋务最活跃的时期。电文涉及内容较广,包括对外交涉、督办铁路,以及办报、办厂、办书院、开矿、修驿路、修电报线等方面的内容,反映了他务实兴业的诸多事迹。

本次展览结合河北博物院馆藏优势,通过大量珍贵文物,回溯明清士大夫群体的品格追求与价值理念,探求其中蕴含的道义精神,让广大观众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在新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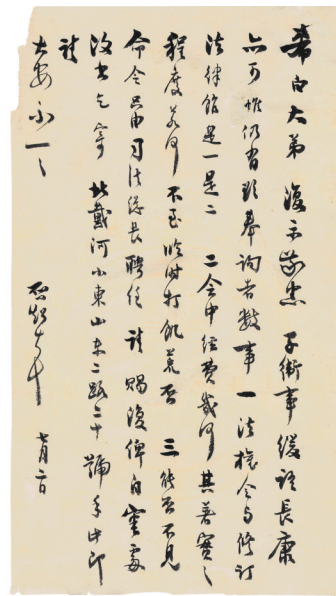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尺素情怀

清华学人手札展



周诒春致曹云祥信 19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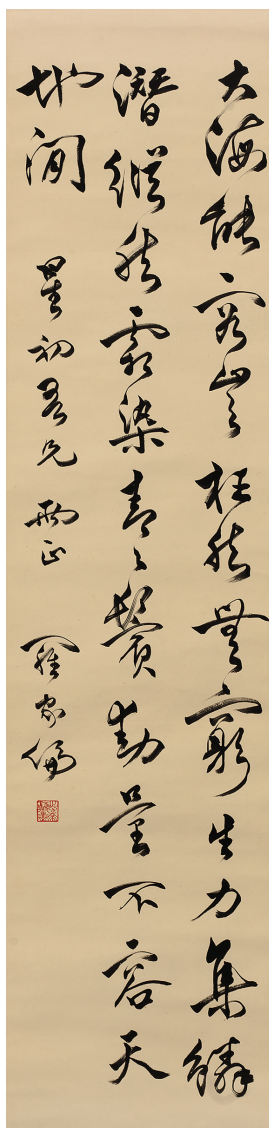


梁启超致孔昭晋信 192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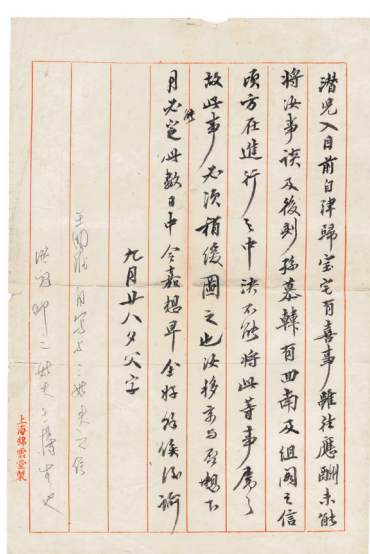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水木清华,钟灵毓秀。一部清华办学史,就是中国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科教强国奋斗史的缩影。在清华110余年(始于1909年清政府设立的游美学务处肄业馆)的办学历程中,学校不断延揽各领域的优秀学者,荟萃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为社会不断输送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已经成为人们衡量一所大学好坏的重要标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前贤往矣,我辈已无缘一睹其风采,亲炙其教诲,但是“手泽存焉”,从他们留下来的信札、讲义、诗文手稿中,我们仍可感受前贤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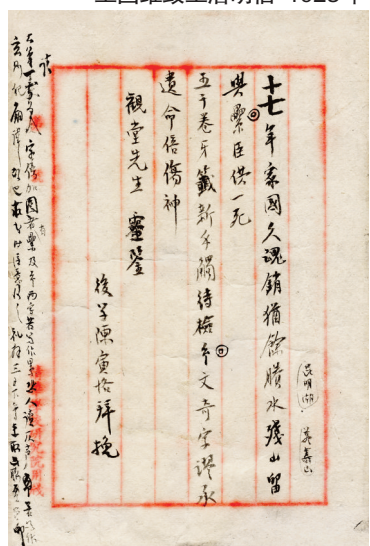
“尺素”虽小,然则小中见大。在这纤薄的纸张里,在这或工整或飘逸的墨迹中,若隐若现、呼之欲出的是隐藏在背后的一位又一位有个性、有喜怒、有情怀的人,是在“正襟危坐”的传记和正史中难得见到的另一种细微的丰满和真实。“前贤遗墨,片羽吉珍”,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设展“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让我们有机会亲炙大师手泽,走近大师内心,“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罗家伦赠江杓七言行书条幅



王国维致王潜明信片 1923年



陈寅恪悼念王国维挽联 1927年

清园祭酒

祭酒者,古时主持国家祭祀大礼之有德长者。汉代有博士祭酒之设,西晋改称“国子祭酒”,隋唐后皆沿用国子监祭酒,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政官员,相当于后世大学之校长。清园祭酒,此处代指清华大学的校长们。无论何种事业,人,无疑是诸多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校长作为一校之长,更是教育事业成败兴衰的关键要素。

清华大学百余年的办学历程,其每一阶段所取得的成功与发展,皆凝聚着校长们的心血,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阶段:一是由游美肄业馆到清华学堂始创,清华学堂首任监督周自齐、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堪称代表;二是大学部与研究院肇始阶段,周诒春与曹云祥贡献最多;三是国立清华大学之初,罗家伦功不可没;四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传奇,梅贻琦居功至伟;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重大转型,叶企孙、蒋南翔最为卓著;六是改革开放后新的综合性大学布局与重建,高景德、张孝文、王大中,继往开来;七是稳步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新百年开局,顾秉林、陈吉宁、邱勇,再接再厉。限于展览体例,此单元止于蒋南翔校长,其致邓小平同志函,开启了改革开放中国教育新局面。

国学传奇

在近代国学研究实践中,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大导师为代表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果,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他们之所以能够领衔近百年的国学研究,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所秉持的路线始终是与世界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东方学研究联结在一起,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铸就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由王国维实践、陈寅恪提出的“把地上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印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古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三种方法,开辟了“清华学派”乃至整个近代国学研究的学术方法。而多种语言的修养、多个现代社会学科的训练、中西融通的学术视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自信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人格,都成为促成这种国学研究取得重要成就的重要因素。

(下转7版)

伟大精神的历史见证

两件九江市博物馆藏“98抗洪”文物

陈昱廷

1998年夏,江西九江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留下了一件又一件历史见证物,以九江抗洪为代表的“抗洪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当年,九江市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在自身抗洪抢险任务重、紧急转移馆藏文物保障文物安全的情况下,经上级组织批准还同时开展了抗洪文物征集工作。短短的40多天里,共征集“98抗洪”实物500余件(套),后经江西省文物专家鉴定组认定,二级文物76件(套),三级文物329件(套),资料100余件(套),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以日记、信函、流动墙报为代表的书籍文献类;以证章、服装、军鞋等为代表的服装服饰类;以救生衣、测沙器等为代表的救援工具类;以决心书、日记本等为代表的请战类文物;以及劳军和杂项类文物等。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各类管理调度、护堤请战以及军民慰问所用的旗帜类文物50余件(套)。这其中,既有曾经飘扬在抗洪一线的以某军签名旗为代表的各类英雄旗帜,也有堵口沉船船旗为代表的组织调度旗帜,以及以抗美援朝老战士签名旗为代表的社会各界支援旗帜,而党员、团员突击队旗就有20件。

1998年九江抗洪堵口沉船船旗(图1)该文物纵长58厘米,横长73厘米,由红、白、蓝三色条组合而成。此件藏品背后承载着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乃至世界防洪史上的奇迹。

事件追溯到1998年的8月7日下午,九江城防大堤4至5号闸口的堤脚突然塌陷溃决。瞬间,大堤被撕开5米多宽的决口,在不到40分钟里决口由5米到30米再到60多米,滚滚长江水以每秒400立方米的汹涌之势倾泻而出,冲向九江城区,如不及时堵住,全城42万群众将陷入灭顶之灾。由于口子越撕越大,堵口物资和器材几乎都快用完了,危在旦夕必须遏制决口的继续扩大。在这危急时刻,抢险指挥部决定沉船堵口,当天下午抢险人员共沉船9艘、汽车2辆。九江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三色旗,正是其中一艘沉船上的。

当时决口附近几乎所有的民船都被统一征用,民船是百姓的私有财产,用于堵口对百姓个人和家庭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但所有的船主都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沉船堵口工作,简简单单的一面旗帜,让我们永远铭记1998年那一发千钧的时刻,也昭示了军民一心、抗击洪灾的团结之情。

1998年九江抗洪“抗美援朝时期老战士”签名三角旗(图2)精神力量的传承很神奇,可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抗美援朝精神”与“抗洪精神”同样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两种精神在此件藏品中隔空共鸣。



图1 图2 图3

此件藏品是长约60厘米的红色三角旗,上面有醒目的黄色颜料手写的“抗美援朝时期老战士慰问组”,仔细端详可发现上面还分布着11名老战士的签名,右下角落款日期:1998.8.10。1998年8月10日的江边大堤是当时九江最惊心动魄的地方,这11位平均至少是知天命年纪的老战士顶着烈日再次前往最危险的地方。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这面三角旗正是伟大精神的传承、传奇历史的见证。

这些极具纪念价值的抗洪文物的征集收藏(图3),得益于当时南京军区驻九江抗洪前线指挥部和武警驻九江抗洪部队的大力支持,抗洪部队在完成使命凯旋之前专门组织了几次向九江市博物馆捐赠抗洪文物的活动。

作为“抗洪精神”发源地的文博工作者,我们要以馆藏抗洪文物为研究对象,加快抗洪文物的整理、研究、阐释和传播的步伐,其征集范围应从初期的围绕抗洪事件本身产生的文物,扩展到反映抗洪事件的音像制品、记录抗洪精神的历史文献及艺术品创作等,在书籍文献的征集方面更应设立专门的口述史研究部门作为突破口,以高度的使命感和专业性,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洪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为发展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新贡献。